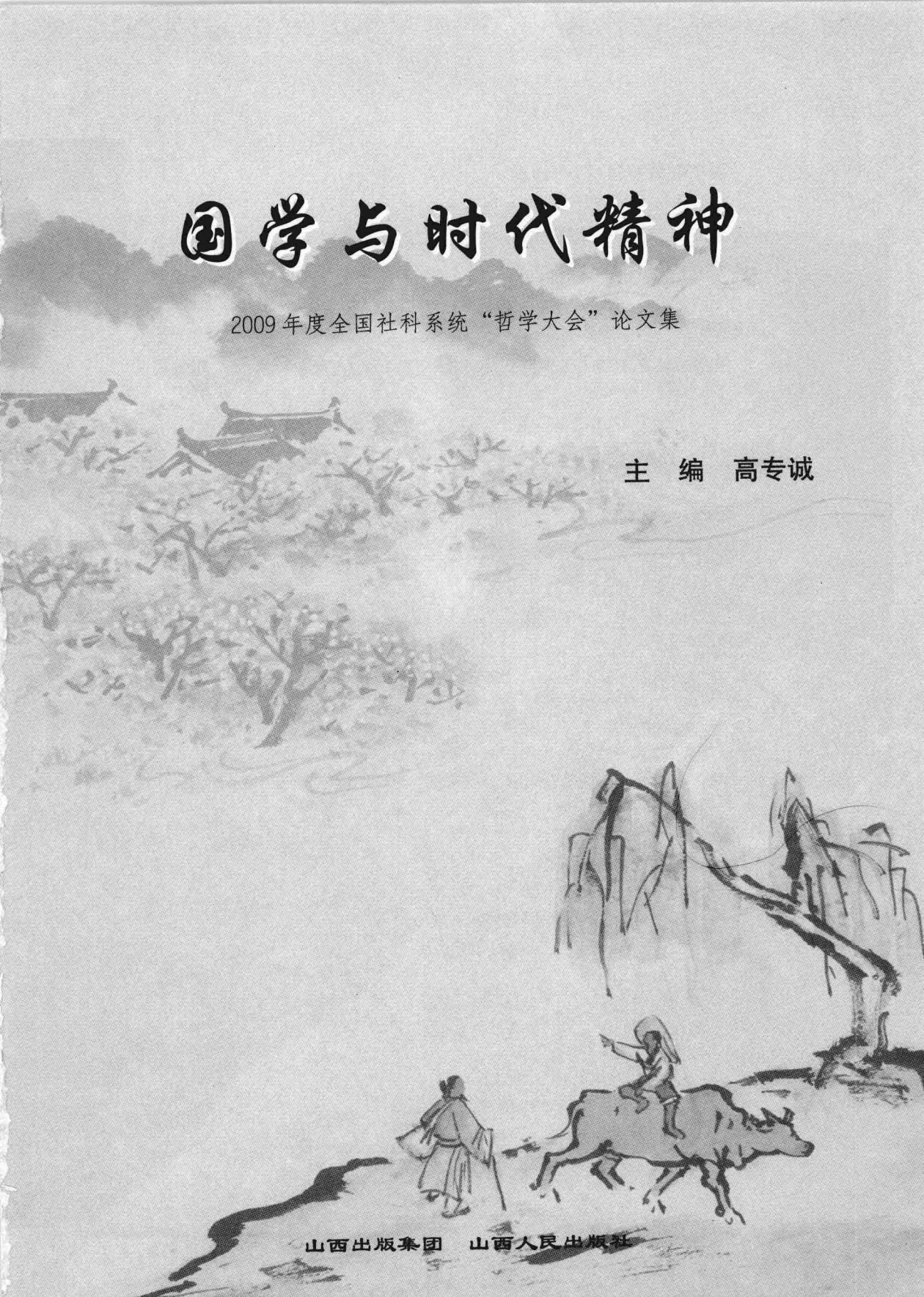


国学与时代精神

2009 年度全国社科系统“哲学大会”论文集

主 编 高专诚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wash illustration depicting a rural scene. In the foreground, a scholar in traditional robes walks towards the left, carrying a staff. To his right, a plowman sits atop a large ox, pulling a simple wooden plow. The background features stylized trees and a small building with a tiled roof, all rendered in a minimalist, expressive ink style.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学与时代精神:2009 年度全国社科系统“哲学大会”
论文集 / 高专诚主编.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0.8
ISBN 978-7-203-06895-2

I. ①国… II. ①高… III. ①国学—中国—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Z126.2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64316 号

国学与时代精神:2009 年度全国社科系统“哲学大会”论文集

主 编: 高专诚

责任编辑: 蒙莉莉

装帧设计: 王光磊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发行营销: 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4922127 (传真) 4956038 (邮购)

E - mail: sxskcb@163.com 发行部

sxskc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 www.sxskcb.com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 太原市力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9.25

字 数: 500 千字

印 数: 1-1000 册

版 次: 2010 年 9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9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3-06895-2

定 价: 5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国学与时代精神（代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谢地坤

当前，“国学热”一浪高过一浪，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媒体上，到处都可以听到国学的呐喊。但是，何谓国学？国学的内涵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在今天提倡国学？其价值和意义究竟又是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却很少有人问津，或者说避而不谈。

哲学原本就是发问和思考的学问，而国学在很大程度上与哲学相关，所以，我们哲学界理应对此做出我们的辨析、判断和讨论。

—

“国学”这个名词是20世纪初产生的，原本是要与非中国的学问加以区分。这种情况大概与20世纪初产生的所谓“国语”等名词相类似。由于其是国粹，所以，现在一般都认为，国学在旧学中的本意，乃是指经、史、子、集的经典训诂学问。自西汉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历朝统治者都对儒学予以特别的重视，儒学实际上成为官学的主体，以儒学为讲研对象的经学研究占有一家独大的特殊地位。古代的太学、国子监这样的国家学府讲授的基本上都是儒家经典，官员的遴选、拔擢在一定程度上也与经学水平有关，甚至还把皇太子、皇帝学习儒家经典的活动设计为“侍讲侍读”和“经筵进讲”的制度。宋人所说的“半部《论语》治天下”，充分说明了儒学在中

国历史上的显赫地位。很显然，儒学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核心和价值基础，是所谓“国学”的主导思想。对此，甚至现在的国家领导人也是承认的。比如，最近有领导人说，“儒学是中国历史上传统思想学说的主流，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支柱和基础，对于中华民族的凝聚、团结和进步，对于中国的统一、稳定和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①显然，对儒学的这种评价和褒奖不能说不高。

但是，我们不应忘记，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文化都不是绝对单一的，从来都是在各种各样的文化形态的相互碰撞、相互激荡和相互交融中发生和发展的。无论是先秦诸子百家，还是西汉初年“以道治国”所达到的“文景之治”，儒学都不处在统治地位。汉武帝以后，儒学虽然占据主导地位，但儒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吸收其他流派思想中逐步发展的。比如，魏晋时期，经学受玄学和佛学影响比较大，既能博取众家之长，又喜标新立异，反映了其哲学思辨能力的提高；唐宋时期，儒、道、释三家合流，尤其是宋明理学已经脱离了中国古代以礼教制度为重心的儒家文化传统，开始转化为以仁学、理学、心学为主体的精神学说，表现了与佛家文化和道家文化的紧密结合。由此来看，旧学中的所谓国学，乃是以儒学为主，并且随着儒学自身的变化和发展，其中也夹杂着道家 and 佛家的思想，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也是其生命力之所在。

但是，有些学者在当下的讨论中似乎还不如古人胸怀宽广。一是在儒道两家谁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主干的问题上争论不休；二是在大谈复兴国学的同时，为获得“道统”而一争高下。比如，

^① 贾庆林：《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09 年 9 月 25 日第 3 版。

有人主张仿照晚清魏源的主张，恢复两汉经学，以为这是国学的正宗；也有人认为儒家道统更早，即使是对儒家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孟子和荀子也不能构成儒家的道统，因为孟、荀思想都不符合早期儒学观念，应当“回到子思去”，这样就可以重构儒家新道统。^①如果说前者的辨析主要是根据新出土的“郭店楚简”的讨论而展开，具有一定的学术参照意义，只是其学术视野过于狭窄，那么，后者的争论就没有什么合理性了，因为我们看到的不过是复古主义的把戏。更有甚者，还有些人热衷于充当所谓的现代“国学大师”、“大儒”等名号，这明显与他们公开标榜的爱国主义、弘扬祖国传统文化的宗旨相去甚远。

二

我们今天所说的国学，并不是旧学意义上的“国学”。但是，这个“国学”概念到底是指什么，实际上一百多年来学界对此一直未能达成一个共识。

从历史发展来看，自16世纪以来，中国虽然还有被称作“盛世”的“康乾”时期，但那时在思想观念和国家发展的趋向上都已经显示出了落后性。与此形成明显对照的是，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洗礼的西方诸国，其科学技术得到长足发展，经济强盛。随着东方和美洲大陆的发现，西方的商贸、军事、政治及文化面向全世界展开扩张。还是在明朝末年，伴随着传教士在世界范围的传教活动和西方诸国对华的渗透、扩张甚至侵略，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已经开始发生影响。及至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中国积弱积贫，在抵抗西方列强的侵略时每每失败，使有识人士不得不从明末的“夏夷之辨”和

^① 参见梁涛：《儒家道统论的检讨与重构》，载《学术月刊》2009年第2期。

“礼仪之争”转向学习西方。这样一来，西学东渐成为时代潮流，我们也从单纯学习西方技术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发展到中西分野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再从完全接受西方文明的“全盘西化”转变为重视中西交流、以促进中国文化发展的“中西融通”。这段历史呈现的不只是在我们这个东方大国的日渐式微的国力和与之相应的中西文化的分野及融通，更反映了中国几代知识分子对本国传统文化认识的逐步深化。

从文化发展观来看，中国人近代接受西方文化，完全是因为我们这个古老的文明体系在近代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迫使我们必须在传统文明与现代世界之间加以痛苦的抉择而不得不做出的决断。实事求是地说，在最初与强大的西方文明相遇之际，我们传统的文明陷入了一种“失语状态”，我们不得不用西方式的概念系统来表达我们的思想，甚至某些时候因为矫枉过正还出现了全盘西化、民族虚无主义的倾向。比如，在五四运动时期，不仅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甚至还有人提出取消汉语、取消中药的主张。但也就在此同时，不少学者看到了传统文化的价值，提出了“整理国故”的主张，并付诸行动。从西学进入中国开始，我们就一直陷入这样一对矛盾之中：承认和接受西学，就意味着我们的思想被西学所“同化”，这种文化的“进步”同时也使我们与自己的传统文化相“异化”，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与自己的文化传统相断裂。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在接受西方哲学和思想方面时是有条件的，是从我们自己的立场和需要去理解和解释西方的，这又让西方哲学和思想在中国发生与自身的“异化”。

承认和认真分析这种中西文化的“同化”和“异化”，既对中国哲学和文化事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也对我们拿出什么样的理论去支撑中国的发展道路至关重要！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们这

个东方大国自 19 世纪以来面对着西方列强的侵略，我们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同化”和“异化”既是一个我们无法做出选择的事件，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文化自觉行动。伴随着工业革命的步伐，各种文化相互冲撞、相互融通已经是不可回避的潮流，只要我们认真观察我们生存的现实世界，思考工业文明对我们传统文明的挑战，我们就不难发现，“中国文明的价值世界与历史世界在传统中的自在关联，在现代出现了断裂，迫使文明必须从自在走向自为。”^①假如我们一定要自我封闭，其结果必然是自我放逐，从而使自己处在世界文明的边缘。这里既有哲学所说的“普遍性”，即一种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与融合，也是我们所处历史时期的时代特征。

在确定上述历史事实和理论前提下，我们再来讨论上世纪初出现的“国学”这个概念，可能更有意义。

当时，西学繁衍于中华，而我国传统文明则日渐式微。为区别于西学，更为了保存“国故”，当时有人把我国传统文化中的“诸子百家”、“六艺、五术”等统称为“国学”。但是，关于“国学”的定义却是含混不清。国粹派邓实在 1906 年撰文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②邓先生的这个“国学”概念广泛而模糊，用现在语言来说，它的意思就是，凡是在中华大地上有用的学问，就是“国学”。但是，这个定义有一个好处，即不排除外来文化，从逻辑上接受了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后来，金岳霖先生对此认识更为明确，他

① 张志强：《哲学·文明·现代性——“古今中西”之争中的中国哲学》，载《中国哲学年鉴》（2007），第 64 页。

② 《国学讲习记》，载《国粹学报》第 19 期。

在评价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时提出，“中国哲学”这个名称不贴切，故而要以“在中国的哲学”替换之，就是对这个问题的深刻认识。事实上，中华文明曾经是一个开放的文化系统，我们从汉唐直至宋元期间就接受了不少外来文化的影响，比如唐朝中国学者对佛经的大规模翻译和借鉴。近现代以来，虽然我们是被迫接受西方文明，但实际上是扩大和加深了中华文明的内涵，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由此我们可以说，当下的中国文化既有自己传统的积淀，也包含了接受东西方文化、从而产生出的新的有活力的东西。

假如有人在今天非要说，中国文化，即所谓的“国学”，就是“民族之学、国粹之学”，这样的说法只能是既不符合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就拿章太炎先生来说，他是“国学讲习会”的开创者，现在被视为纯正的国粹派。但是，他的思想著述并非只有传统国粹，而是相当复杂的。他一方面受传统儒学和佛学之濡染，另一方面又受西方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和生物进化论所浸淫，所以，他的著作中既有西方哲学、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新思想、新内容，也有关于传统经史子集的论述。他的平生所为也是相当矛盾，他既张扬国粹，却又反对尊孔；既强调道德的力量，却又主张个性的绝对自由。这就难怪他的政治主张常常是摇摆不定的了。

再说现在常常被人提及的上世纪 20 年代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四大名师“王、梁、赵、陈”，他们哪一位不受西学影响？哪一位不是在有意与无意间地传播了西方文化呢？梁启超以其在中国的特殊地位，竭力介绍和诠释西方启蒙思想家的政治社会观点，如卢梭的“天赋人权论”、“社会契约论”，提出了先有“新学术”，而后才有“新政治”、“新器物”的主张，在哲学方面先是介绍近代经验论和理性论的两大代表人物培根和笛卡尔，而后介绍康德哲学。梁启超着力阐发的人格独立、思想自由、社会改良

的思想，在当时受到千千万万学子的欢迎，使他成为那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导师。赵元任和陈寅恪都是留学海外十几载，精通多国语言，尔后再用西方的方法研究语言学和历史学，成为一代宗师，达到后人难以攀登的高峰。四大名师之首的王国维则深受德国哲学的影响，尤其重视当时很有号召力的叔本华和尼采的意志论，他早年许多著作都是介绍和宣传康德、叔本华、尼采哲学思想的，其基本主张就是陈寅恪概括的“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但是，王国维并非食洋不化或食古不化，而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观点和方法剖析和评论中国古典文献的开风气者，从而在借鉴西学的同时，在哲学和文化的创新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也正因为如此，王国维在 20 世纪初就提出“学无中西”的观念，他说：“学术之所争，只有是非真伪之别耳。于是非真伪外，而以国家、人种、宗教之见杂之，则以学术为唯一手段，而非以为目的也。”^①

及至 20 世纪 40 年代，以张君勱、张颐、金岳霖、冯友兰、熊十力、贺麟等人为代表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在中华民族国难当头的年代，从救亡图存中激发出热情和才智，遵循老一代学者开辟的理路，有批判地继承中西文明的成果，走出了不同文化相互交流、相互融通的道路，使得这个时期的中西文化达到前所未有的会通、融合。这大约就是佛教禅宗所说的“透网金鳞”的真义之所在。只有经过奋力拼搏、跳出囹圄的人，才能悟出何为真理！

明白了中国文化在这段历史时期的发展，我们也就知道了“国学”这个概念在 20 世纪大多数时间中为何被弃置不用的道理。

三

现在已是 21 世纪，我们在讨论科学文化的进步和发展的时候，

^① 《王国维学术经典集》（上），99 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

仅仅依据狭隘的民族主义热情肯定是行不通的。同样，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前辈学者的“学不分东西”的观点上，也不符合时代对我们这一代人提出的要求。

毋庸讳言，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就是全球化。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及其在现实世界的应用，已经把人类居住的世界变为“地球村”。由资本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全球化，实际上已经把各个领域都纳入全球化的潮流之中。最近，著名科学家丁肇中先生说，现在具有世界意义的科技项目都不是由某一个国家完成的，而是由多国投资和参与，其中大多数都有中国科学家的参与，甚至还有中国政府的资助，比如人类遗传基因图谱、国际空间站、在瑞士的全球最大的正负对撞机，等等。这就是科学技术的力量，这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力量！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和对话都是不可避免的，任何一种文明都不可能不受影响地独立自存下去。从世界范围来看，文化的交融是一种趋势，强势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影响是一种客观存在；从某一国来看，文化越来越显现出一种多元化的趋势。因此，作为世界文明的一枝，“中国文化的自我理解，已经无法在中国学术界的境遇中自给自足地循环下去。”^①这样一来，我们今天分析和讨论“国学”，就绝对不能自说自话，而是要以世界的视野去观察这一现象。

在当今世界学术视野中，“国学”虽然是一国之学，但是，我们深究下去，有关国学的定义并不相同。其一，一国之学是以一个国家以某种语言为核心的历史和传统文化为学科对象，比如，“波斯学”、“印度学”等；其二，一国之学是关于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形态及其价值观的知识体系，比如，上世纪常说的“美国学”、“中国学”等；其三，一国之学是在当代全球化背景下的

^① 杨照生：《国学与汉学》，载《光明日报》2009年6月29日。

一种民族文化的理论自觉。

我认为，现在我们所说的“国学”属于第三种情况。之所以这样说，我们可以回顾最近30年的中国哲学发展。这些年来，中国哲学界以中国哲学范畴及其体系、现代新儒家思潮、中国哲学诠释学和简帛文献中的中国哲学思想、经学思想的研究为主题，迫切希望有所突破、有所超越。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前些年围绕“中国哲学之合法性”问题而展开的争论。它是对中国哲学史观的一个辨析，也是对百年来中国哲学学科的建构与发展进行的反思，而其中主要关涉的问题，即是如何处理“哲学”作为某种自西方引进的诠释方式和学科建制与中国本土固有的思想文化和典籍文献脉络之间的关系。讨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并不是说中国哲学“不合法”，对此，冯友兰、张岱年等前辈学者已有定论，而是指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独特性如何与世界哲学的普遍性相融合的问题，中国哲学如何参与国际学术界的文化与文明对话的问题，特别是中国哲学如何以自己既传统又现代的独特形态去回应今天全球所面对的普遍伦理、人权、正义、生态、性别等问题。相关的讨论参与者众多，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是，这几年来，伴随着我国国力的提升和“国学热”的兴起，好像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似乎我们中国人可以完全不用理睬外部世界的变化，坚守甚至回到我们的传统文明就可以独立自存。

这种热情固然可嘉，但它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时代精神，而且在逻辑上构成了中国文化发展的超越与回归的悖论。即使就其目的与愿望而言，它是希望突破，但从其逻辑结果来看，非但没有实现突破，反倒是引起文化保守主义的复兴。正因为如此，虽然有些人现在对复兴国学极其热情，但这个主张却一直受到国内学界的质疑和批评。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教授包弼德（Peter K. Bol）最近明确说，中国并不存在统一的“国学”，“首先是，国学到底是指什么？如果说是传统道德，而传统道德又是指什么？传统道德

自身有着不同的内涵，互相也存在着不一致性，有着互相的批评和争论，而这些不同观点和争论是有其各自思想价值和社会合理性的。”“从这点上看，谈国学根本没有意义。如果说国学是指中国传统文化，所有的中国文化都包括在内，我可以赞成。如果说中国全部的文学、历史和思想都统一于一，那我不相信，也不同意。这就如同说我们西方文化、西洋学有统一的思想一样，这些说法是一样荒谬和不真实的。”^①何兆武先生也说：“中学西学的对立是不存在的；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色，但这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是普世的。”^②

最近，周汝昌先生在悼念季羨林的文章中说：“乘风尊国粹，扬帆化西洋。”我们今天讨论国学问题，应当有老一代学者的眼光，不是食古不化或食洋不化，而是要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立足于中国，又勇于面对国内外的现实问题，志存高远，继往开来，以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坚强自信和宽广胸怀，为吸收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繁荣发展我国学术文化，用我们的理论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奠定坚实的基础。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我在关于“中国哲学发展”的文章中提出三点主张。其主要目的是，既要使我们的哲学恢复“昨日的辉煌”，而且还要更上一层楼，我们的哲学理论不能脱离中国社会现实，而是要从当下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提炼出哲学问题，为中国的社会发展及其未来导向给出规律性的阐述和有力的理论支撑。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哲学必须进行理论创新，不断拓展自己的理论内容和理论形态，在满足时代发展要求的前提下，不断促进自身的发展，真正实现“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这一伟大宗旨。因此，我们的哲学应当实现这样几个转变：

第一，从“体系意识”转变为“问题意识”，实现哲学范式的改

① 《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9月3日。

② 何兆武：《中学、西学与现代化》，载《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4期。

变。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不只是在于我们是否要面向生活世界，而且还在于我们在何种程度上不依赖于我们的主观意识去客观地认识和把握现实社会的活生生的问题。所以，要想使我们的哲学理论真正发生变化，适应时代发展的内在要求，我们就必须以“问题意识”为中心，自觉地对当代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做出我们自己的深刻反思，在思维方式、认识方式和表达方式上做出改革，勇于解答当代的重大思想问题，引导和塑造时代精神的发展，从而实现哲学的当代价值。

第二，从“本土视阈”转变为“世界视阈”，努力扩大我们的哲学视野。哲学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相统一的学问。我们中国的哲学当然要着力解答中国的现实问题，但这只是中国哲学的特殊性和民族性的体现，它还必须面向世界，要为探索世界性的普遍真理做出我们中国人的贡献。更进一步说，当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全球化，一个国家或民族的问题往往是与整个世界联系在一起的，它要求我们“改变只注重从一个国家、民族的视野来观察和谈论问题的方法，转向用全球化的观点来思考和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用全球性思维来补充和完善民族性思维”^①。在这方面，我们要处理好中国哲学传统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文化传统及哲学的关系，主动迎接各种思想文化的挑战，随着世界历史的变化而不断更新自身的研究方式，从而在世界哲学的发展图景中占有一席之地。

第三，从“马、中、西”三个学科的分立转变为三个学科的“视阈融合”，逐步确立“大哲学”的观念。哲学原本就是包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础性学科，直到近现代才脱离了自然科学，但仍然保留其博大精深的本质特征。但是，我国哲学界近几十年来一直受三个学科的人为划分而壁垒分明，导致了眼界狭隘、思想僵化，甚至在某些

^① 丰子义：《全球化与唯物史观研究范式》，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共同性问题上缺少共同语言。进入新世纪后，哲学界自觉地召开了数次全学科会议，开展了各个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对中国哲学的发展起到一定作用。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避免从事这些学科的学者各自表述自己学科的立场和观点，以共同关心的哲学话题来带动思想的沟通和学科的交流，确实做到综合创新，使我们建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真正做到“穷通古今之变，会通天下普遍之学，达乎天下普遍之理”。

实现这三个“转变”，理应是我們中国哲学界的学科自觉和理论勇气，也是我们共同面对的历史重任！不过，在具体实现这些转变的时候，对各个学科而言，重点和难点都有所不同。比如，实现第一个转变应当把重点放在如何恰当提出问题和合理解决问题上。我们不能因为重视现实问题而沦为一时一地的现实论证，同样也不能囿于学术诉求而陷于形式主义，而是要使现实问题的研究与哲学的超越性相互关联、相互规定，以达到现实性与超越性的有机统一。实现第二个转变的重点，则是要拒斥一些学者抱残守缺、故步自封、妄自尊大的心态，而是要以博大的胸怀兼容并蓄，融通中西，将当代的先进哲学思想为我所用。实现第三个转变的关键，则在于我们学者的理论自觉，如果我们没有融通中西哲学的勇气，就无法为中国哲学的新生提供广阔而深厚的文化资源和学术资源。

环顾世界，西方哲学在经历了几百年的辉煌后，虽然还在“没落”中迎接挑战，但近20年却没有让人看到“落日余晖”的希望。反倒是中国哲学几经摧折，仍然能够自我修复，不断更新自生，兼容并蓄，发扬光大，显示出了顽强的生命力。我们深信，“中国哲学随同中国文明一起，已经给了世界的哲学以‘曙光’。”^①随着国家的不断强大，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奋斗，我们的哲学事业必定会展现一番新面貌，创造出中国哲学的新天地！

① 叶秀山：《欧洲哲学发展趋势与中国哲学的机遇》，载《浙江学刊》2007年第6期。

目 录

一、国学发展的历史逻辑

中国道路与传统文化	何锡蓉 (3)
国学在中华民族振兴中能有多大作为	郝立忠 (16)
百年国学演变概览	赖功欧 (25)
关于“国学热”的几点思考	胡发贵 (46)
从“以古释古”到“代圣立言”	
——谈传统学术话语系统的恢复与再生	李会富 (51)
“国学热”的兴起与时代精神的发展	李玉萍 (59)
中国传统文化与全球化背景下的价值认同	
——以“天人合一”思想为例	刘 东 (64)

二、国学专题与人物研究

“稷下学派”考疑	高专诚 (73)
荀子的礼法之治	
——论荀子政治伦理思想中“儒”与“法”的互补与融合	路 强 (86)
先秦儒道两家的理论旨趣与儒道互补中的若干理论问题	代 云 (95)
论先秦天命观的发展	孙 伟 (111)
早期儒家“和为贵”思想中的社会和谐与社会公平精神	王 剑 (121)

庄子逍遥无待的自由精神	唐 坤 (126)
王弼“以无为本”的本体论思想研究	梅良勇 张贤华 (132)
李觏教育思想探析及其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焦秀萍 (140)
胡瑗的教育思想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	梁劲泰 (146)
曾国藩的国学书目与其本原思想	梁世和 (154)
中国哲学现代化的方法论问题 ——《庄子·内篇》道论研究引言	陈清春 (169)
“以民为天”考	降大任 (186)

三、国学的现代性问题研究

传统“家国学说”的现时代批判	王亚南 (193)
乡村建设与民主建国：论梁漱溟先生的自由民主思想 以古为鉴 继往开来 ——先秦儒家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	高秀昌 (215)
王阳明“龙场悟道”对现代人精神追求的启示	杨东柱 (236)
儒家“孝悌”思想现代化反思	王路平 (244)
	孙彩燕 (251)

四、中西哲学的比较与互通

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

——《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的阐释	余秉颐 (265)
孟子困境的“李约瑟视角”	张增祥 (274)
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家庭与城邦	王玉峰 (285)
达尔文进化论的理论价值及面临的挑战	程倩春 (295)
“逻辑冰峰”上的人文主义 ——石里克科学人文主义思想研究	郝 苑 (300)
从“发展”、“和谐”说开去 ——兼评中西方文化差异	马燕萍 (311)